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在二大的文件中,“民主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革命的战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等多种表述并提,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相同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从提出到转变充满艰辛。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对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有较多的共识,但对要不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存在分歧。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态度是肯定的,而马林的态度是否定的。至于如何保持这种独立性,要不要争取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是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但偏于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共产国际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多数是正确的,东方便萨发罗夫、远东局维经斯基均不乏真知灼见,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上却以势压人,将自己的意见冒充共产国际的决定强迫中共接受。1923 年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采纳了马林的主张,使之合法化、正式化了。实际上马林轻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共缺乏信心,势必迁就国民党。历史表明,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不容易,争取实现更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 中共二大; 西湖会议; 马林; 国民党; 联合战线

中图分类号: K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1-0098-11

Proposal and Its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SHAO 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document of the Seco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PC, the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the front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etc. were put forward, and their essential content and spiritual essence are the same. The propos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are full of hardship, and there were more common views for the necess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in the communist camp, without basic differences. The difference was whethe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 be maintained or not. On this major issue, the attitud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re affirmative, but Marin's is negative.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posed the correct principles on how to maintain this independence and whether striving for the leadership of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but those principles tended to be ambiguous and abstract, and lacked the feasibility. Most of the guidanc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or young CPC are cor-

收稿日期: 2012-11-16

基金项目: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2012 年上海统战史研究课题、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项目(SJ0703)

作者简介: 邵 雍(1953-),男,上海人,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秘书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rect, there is no lack of insight 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uch as SaFa Rove in the Oriental Department, Grigori Voitinskyn in the Far East Bureau, etc. However, Marin,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verwhelmed others by his power on 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and forced the CPC to accept his opinions by taking his own opinions 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January Res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dopted Marin’s opinions in 1923, which make Marin’s opinions legalized and formalized. Actually Marin despised the CPC. Marin’s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CPC would give in to Kuomintang inevitably. History had shown that it was easier to propose the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of united front than to realize them. In a sens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pos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Key words: the Seco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PC; West Lake Conference; Marin; Kuomintang; united front

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标志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大进展。“民主的联合战线”是怎样提出来的、提出以后又有什么转变、为什么会有转变以及孙中山的国民党是如何回应的,这些问题是本文要回答与阐释的。

(一)

1920年夏,共产国际“二大”最后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与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1] (p139)} 共产国际“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 (p143)} 1921年6、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必须“严厉实行”。^[2]

为了落实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推动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举行了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 (p98)} 会议期间列宁约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与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当即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张国焘回答说“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4] (p199)} 事后张国焘认为列宁的问话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而“秋白和我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4] (p199-200)}

参加远东会议的少年中国学会代表高尚德回国后,与该学会会员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人根据会议精神在1922年夏起草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提出“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此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在此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5]

曾任中共中央局成员的李达后来回忆说,1922年夏季“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6] (p587)} 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远东大会的精神,并据此在6月15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公开提出:

“中国现存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7][p37]}“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7][p45]}中国共产党宣布“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7][p45-46]}从此国共合作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初步改变了中共一大对中国其他政党不联系不合作的态度。

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一切联系。”“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8][p6-7]}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8][p14]}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与会者李达回忆说:一大开会时就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有的说,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9][p11]}在大会宣言的草稿中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9][p13]}包惠僧则回忆说“对于孙中山的问题是在讨论宣言时提出的,我对于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广东的军事独裁致民不聊生,‘我曾到过广州,广州是满街无兵司令,军人横行,遍地是赌场(名为楼上银牌)、鸦片烟馆(名为谈话处)、妓馆’。那里还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呢?况且他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东西,做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与李达表述不同的是,包惠称“当时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见”。^{[9][p321]}可与包惠僧的说法互相印证是陈公博的回忆,陈公博说:宣言“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对,辩论很久,宣言终于通过了。”不过经他与周佛海商议,到会议最后提出了一个折冲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回广州后,陈公博向陈独秀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9][p421]}李达也说“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9][p13]}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和王烬美、许白昊等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部分代表。张国焘在二大上报告了远东大会的经过,分析了国际的局势,“同时大家又研究了国内的局势,提出本党对时局的主张,因此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会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认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6][p587]}经过与会代表们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再次使用了“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提法,对6月15日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7][p116]}

二大还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说“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通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但同时这个奋斗的用意是真正无产阶级争斗的革命宣传……须要无产阶级领导他们自己。”^{[7][p77-78]}《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将“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与“民主革命的战线”两个概念并用,主张“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一方面加

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位的奋斗……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7] (p62-63)} 二大《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则使用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的概念,指出“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7] (p85)}

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画如左:

(A) 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 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 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7] (p65-66)}

由此可见,在二大的文件中,“民主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革命的战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等多种表述并提,文字略有不同,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通过专项决议的“民主的联合战线”。陈独秀在中共三大致闭幕词时指出,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1] (p477)}

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早在1896年所作的《党纲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因为这种无限权力是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主要障碍……所以社会民主党宣称,它将支持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阶层和等级。”^{[10] (p91)} 这里面包含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反对专制当局的重要思想。1899年年底,列宁撰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既要“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指出这个运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努力夺取政权”,又要“指出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将对我国政府蛊惑人心的诡计进行斗争”。^{[11] (p207)} 这时列宁进一步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而且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了,只要它是“反对专制制度的”。

(二)

二大闭幕以后,陈独秀等人继续在报章杂志上宣传“民主的联合战线”。

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发表了陈独秀《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认为“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象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中国共产党“应该理解在目前中国劳动运动第一战线上,与他党真心做劳动运动者有同一的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

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12] (p368)}

9月20日陈独秀发表《造国论》,认为“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6] (p327)}

11月7日李大钊在《晨报》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大力宣传“民主的联合阵线”。他说“这个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13] (p401)}

1923年1月陈独秀在《向导》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指出“中国政治改造之目前第一步……是要比较进步的党派即刻觉悟自身的价值与使命,相互捐除宿怨联合起来,打破最黑暗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曹錕等)及卖国官匪(新旧交通系、安福部等)互相勾结的反动的政局”^{[12] (p408)}他呼吁全社会各阶级各分子“快快起来加入打破反动政局的联合战线呵!谁是爱国者便应该担任这联合战线上之第一个炮声!”^{[12] (p409)}

3月1日《少年》第7号发表《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怎样在中国应用?》,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努力组织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之革命分子为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主力军,再逼迫其余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加入此联合战线……在这战线上,我们应该用‘建设统一的独立共和国’为口号以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6] (p352)}

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第22期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称:中国“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12] (p451)}

由此可见,直到三大召开之前,中共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斗争对象始终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而联合对象也一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而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认识是有变化的。

早在二大召开之前,陈独秀就于1922年4月6日写信给维经斯基,反对马林“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理由是:(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6] (p36)}

1922年7月马林从上海抵达莫斯科,11日写了关于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红会国际的代表机构,以“调整和促进中国和朝鲜民族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的专题报告。^{[1] (p320)}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决定,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前往广州”,并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1] (p321)}7月27日马林启程来华,8月抵达上海。在上海马林“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4] (p239)}8月28至30日中共中央根据马林提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1] (p326)}在会上马林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并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

政策。他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时。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张国焘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陈独秀在会上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4] (p241-243)}“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14] (p87)}李大钊则认为“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他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4] (p243)}最后,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4] (p243)}会议通过了陈独秀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

在西湖会议前与西湖会议期间,马林对中共中央步步紧逼,先是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继而改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而在他最后质问中共领导人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又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赞成只是一种表态,“决定的政策”与“决议”还不完全相同。那么共产国际当时有没有马林所说的这类“决定的政策”或“决议”呢?根本没有。8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马林的指令只是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1] (p324)}至于如何支持,并没有具体的方案。马林根本没有出示这一指令,擅自将自己的意见作为共产国际“决定的政策”或“决议”,强压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接受,无论在思想作风还是在组织程序上都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对照列宁的主张、共产国际二大、三大的相关决议,还是关照当时中国的政局变化,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与国民党实行党外的合作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孙中山坚持以我为主的党内合作模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根据他的“爪哇经验”力挺党内合作形式,加上马林将自己的意见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得接受。由于西湖会议,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在具体实行中迫不得已改为难度很高的党内合作形式,同时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机遇与风险。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于1922年9月在《向导》发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定性开始有所变化,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而国民党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原因之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12] (p392)}陈独秀改变对与国民党的定性是为了贯彻西湖会议的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一些论证是有问题的。首先,在1922年4到9月间,国民党并没有公布的它的党纲;其次说工人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在国民党内“几乎势均力敌”根本没有任何数据可以支撑,实际上他只是引申发挥了马林在西湖会议国民党领导了大量工人群众的说法。

同年11月陈独秀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期间写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认为在

“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配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展到势力集中……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些采取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战斗过程中,才能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12] (p422-423)} 文章认为“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12] (p423-424)} 在论及“劳动运动”时,陈独秀提出要“筹划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上各项统一的策略,以防欧美资本进攻之余波或及于中国。”^{[12] (p426)} 这是陈独秀赞同并论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首篇文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共如何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切实保持独立性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如在国民党中提出自己的口号,反对国民党与军阀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等,而这是共产国际没有仔细交代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联合战线”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在会上发言首次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公诸于众。他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1] (p352-353)}

共产国际四大提出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认为“现在,在殖民地东方,就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应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只有承认它的这种独立的作用,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1] (p362-363)}

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的策略》又“要求一切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都要严格遵循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策略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1] (p381-382)} “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和每一个国家内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共产国际及其每一支部内部贯彻最严格的国际纪律。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一切支部及其全体成员无比严格地遵循既定的策略……代表大会委托执行委员会极严格地要求所有各党切实贯彻执行所通过的策略决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1] (p385)} 与此同时,该文件承认,统一战线全部策略“也有自己的危险性”,必须“同那些认为好象必然要经过‘民主联合’阶段的幻想作斗争”。^{[1] (p383)}

在具体实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马林的看法并不相同。

首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听了刘仁静的报告后,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没有直接表态,他在会议小结中只是说:中国共产党“有远大的前途”而且以“年青的共产主

义信念的全部热情为之奋斗”但是“必须在那里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1] (p355)} 在这里拉狄克接连提了中共的三个行动方向，只字不提到国民党中去。

其次，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委员于1922年3月27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萨发罗夫，建议他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第二，支持个人与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15] (p238)} 据马林1923年4月3日讲“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远东局发现，从一个大约有250名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独立的政治运动中，可以孕育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这就要求修正4个月前制定的共产党人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政策。对于采取新政策的解释工作多少已准备就绪，为此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的那个局也即将成立，它将指导日本和中国的运动。”^{[1] (p446)} 其实共产国际1923年1月上旬已经决定建立由片山潜、维经斯基、马林三人为委员的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即远东局，并指定后二人参加中共三大。再次，萨发罗夫4月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同中国工人大群紧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了。”二七大罢工“表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迅速提高。在不远的将来可望我们共产党的人数和威望迅速提高。”而国民党由于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的“三方联盟”“使自己在中国各界自由派人士的眼里威信扫地。”报告提出：“国民党不是居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尚未将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威望的团体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产生了一个关于今后把我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的问题。”萨发罗夫“希望尽快实行与修改原则性论点有关的组织措施。这里还包括：撤销对马林同志的委任，在广州创办我们的报纸，等等。”^{[15] (p240-241)} 在萨发罗夫看来，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马林的工作根本不称职，急需撤换，给他发纠错的指示可能也无济于事。马林则在1923年5月31日写给布哈林的信中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仍然幻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群众性的党，我们的党。”^{[1] (p458-460)}

最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对同国民党联系这件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在谈到在中国问题时将维经斯基、萨发罗夫、拉狄克称为左派；将布哈林称为中派；而把马林和越飞归入右派。^{[15] (p458-459)} 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写给布哈林的信中担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另外一个人“会带着建立中国群众性政党的美梦前来，这种谬论将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得到宣传。我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1] (p458-460)}

为此马林在1923年4月3日在上海写信给拉夫斯坦，坚决反对改变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组或小团体，“如果要在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1] (p446)} 5月31日他在写给布哈林的信中声称“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1] (p460)}

“民主的联合战线”在实践上并不顺利。1922年4月间，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向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遭到孙中山的严词拒绝。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到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外面。”^{[4] (p247)} 所以他欢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但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14] (p87)} 因此在三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内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只有少数领导人，还没有在全党层面推开。

1922年8月维经斯基致函中共中央，认为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等决议案“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你们还是应该根据条约原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你们要通过与该党领导人一

起开会和直接向出身于劳动群众的该党普通党员发出呼吁的办法,打破该党领导人坚持不与你们达成协议的顽固态度。”^{[15] (p117-119)} 尽管如此,“民主的联合战线”仍起色不大。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江西等地建立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就是明证。在 10 月 15 日《先驱》第 12 号发表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宣言》中并没有提及具体的发起单位,而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介绍,“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1] (p487)} 宣言从头到尾,国民党一词根本没有出现过。这说明国民党方面对于建立联合战线总体上仍持不合作态度。

(三)

1923 年 1 月 10 日马林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中国情况。12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他的汇报,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6] (p146-147)} 但如何能够做到“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共产国际并没有予以说明,对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更是只字不提。这一决议实际上否决了维经斯基、萨发罗夫的意见,采纳了马林的主张,使之合法化、神圣化了。

6 月 12 日到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议事日程是依据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在大会上做报告时说“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结果是“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1] (p486-487)}

会议期间就“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唯一的政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邓中夏认为“国民党是个内部利益回异的政党,很难改造。”“让孙中山听取新党员的意见十分困难。”^{[1] (p469)} 张国焘对“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表示怀疑。^{[1] (p503)} 还有代表怀疑马林“想要搞垮中国共产党。”^{[1] (p461)} 瞿秋白则提出“我们不能证明国民党不再发展。”“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1] (p468-469)} 毛泽东力言“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分”,“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1] (p470)} 陈独秀强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联合战线的问题,而是在国民党内工作。”^{[1] (p474)} 会上对共产国际一月指示“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本身也有不同的理解。张国焘在发言中强调,马林从莫斯科带来的指示只是说“那些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1] (p475-476)} 马林则自由发挥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期望所有同志都去贯彻你们对中国的指令,而不是由少数人去贯彻。”^{[1] (p481)}

大会批准了西湖会议的决议,即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或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认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

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6] (p181-182)}

7月18日中共中央收到几经辗转的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指示》坚持一月决议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同时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对民族民主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要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通过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建立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阐明孙中山军事行动的意义,并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行动纲领,吸引中国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们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6] (p166-167)} 在这一指示中依稀可见3月间维经斯基、4月间萨发罗夫的正确意见与主张,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其中最有价值、最引人注意的部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关于和国民党联合以及两党关系的决定最后是否生效还有待于国民党方面的最后表态。在此期间陈独秀多次发表文章,公开批评国民党单纯的军事政策,孙中山对共产党这一保持独立性的做法极为恼火。他曾经当面对马林说《向导》“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1] (p425)} 马林对孙中山有过解释,不过他在1923年7月也意识到孙中山“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不请共产党人去工作”。^{[1] (p426)} 于是他化名孙铎在《前锋》月刊发表《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严厉批评国民党说“当国民运动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老实说,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我曾经听见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1] (p523)} “自从国民党被袁世凯打败之后,……党规里采取了对于领袖个人的服从,于是与国民党发展而成一近世政治团体的可能,距离愈远了。革命党没有纪律因此不能存在,但是这纪律决不是秘密社会或宗教团体中的纪律。”^{[1] (p524)} “国民党在回国改组之后,只是发展军事和外交活动,所以他不能领导国民运动。从没有开过大会来讨论组织、政治、政策等。”^{[1] (p525)}

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与党纲草案,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启动。至于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还是次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才最后决定下来的。

“民主的联合战线”从提出到转变充满艰辛。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对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有较多的共识,基本没有分歧,但对要不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存在分歧。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态度是肯定的,而马林的态度是否定的。至于如何保持这种独立性,要不要争取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是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但偏于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倒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陈独秀较早较多地考虑了这些问题,并作出了初步的探索。但如何把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尚需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予以解决。共产国际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多数是正确的,东方部萨发罗夫、远东局维经斯基均不乏真知灼见,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上却以势压人,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意见冒充共产国际的决定强迫中共接受,事后又极力运动,使这种不正常的做法得以弥补与追认,作风很不正派。实际上,马林轻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势必看重国民党,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砝码压在国民党一方。1923年6月20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1] (p477)} 他贬低中国共产党,对中共缺乏信心,势必迁就国民党,力主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这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历史表明,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不容易,争取实现更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C].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 [2]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记者按) [J]. 先驱,1922—1—15.
-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 [4]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一册) [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
- [5]少年中国[J](第三卷,第11期).
- [6]“二大”和“三大”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8]“一大”前后(一)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9]“一大”前后(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0]列宁全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1]列宁全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2]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3]李大钊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4]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吴 贇)